

林江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一九八六年六月



# 椒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一九八六年六月

政协椒江市委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目 录

有关东山花园和台州革命历史的一点回忆	许 杰	1
回忆哥哥毛贤友	毛建予 口述 胡毅博 整理	8
“工合”中党的好干部 <u>毛贤友</u> 同志	金礼让 金礼巧 金礼正	11
回忆长兄、良师——毛贤友烈士	陶萍天	15
许仁运	仙居县志编纂委员会 仙居县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24
悼亡友许仁运	梅法烈	26
忆挚友许仁运同志	周承训	29
* * *		
抗日阵亡青年军官包志秀	陈世漳	31
杨志渠在海门	陈叔英	32
日军飞机葬椒江	张哲能	38
* * *		
回忆岳父萧仲劼	盛 配	41
两度寓椒书画家——蒲华	徐 洲	48
书画古琴家徐元白	娄健秋 篡辑	50
台州中学三次迁校经过	李树德	52
浙江省旧台属六县联立高级中学农科创办经过	颜守训	58
椒江书院	陈钦道	60

六十年来海门文化事业的变迁	林日见	62
盛大的庙会	周宾贤	69
枫山古钟	张哲能	72
邱韵舫诗词选	王及选辑	74

\* \* \*

一度驰誉江南的“三星榨菜”	周瑞珊 王仲禄	口述整理	80
---------------	------------	------	----

### 历史名人咏椒江诗选

补	游清修寺	(宋)赵构	14
	阻潮诗	(宋)赵构	37
	即事	(宋)文天祥	71
白	入浙东	(宋)文天祥	73
	登金鳌寺	(明)林立	83

# 有关东山花园和台州革命历史的一点回忆

许 杰

同志：知道你们在编辑《椒江文史资料》，我心愿把自己差不多在六十年以前的一段和海门东山花园有关的经历写出来，提供你们，作为一点参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成立联合政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那个时候，北伐军的东路总指挥司令是何应钦。他的进展很顺利，没有多少时候，就平定了江西浙江，逼近了上海。那就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年初的事。开始，杭州光复后，虽说是国共合作，但政权的主要部份，还是操在共产党人手里。当时浙江省党部领导，如宣中华等人，都是共产党员。由于浙江已经光复，浙江各县的县长也相继调动，由省府委派即使不是共产党人也是和共产党有一定关系的中间人士担任。别的县份，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更无法说出。但是，关于天台，关于台州的教育界的情形，我是亲身经历，亲自感受过来的事情，那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一九二六年，浙江光复。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自己口中，有时也在学着讲些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等等。但思想还是十分幼稚。而且，我们那时，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革命胜利以后，社会改革和革命优势，自然是属于我们

青年一边，但我们可以估计，如果一时要我们承担起整个社会改革，包括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行政改革，我们的能力，还是很感困难。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还只是逗留在教育改革的阶段，自己认为，社会政治的基本改革，基本在于教育，在于开通民智。说得明确一些，我那时受的是中等师范教育，我们救国的理想，也只认为“教育可以救国”。而且，更有令人觉得可笑的事。我们这种教育救国的见解，结合着自己的一点幼稚的能力与知识，自己认为，我的救国及改造社会、改进地方政治的实践，只能“从小学教育做起”。记得那一年天台新任命的县长叫金剑青，是临海西乡人，因为他事先知道我读书比较好，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青年，主张从事教育救国，要委任我做一个县立中学的校长。我因为自己只是中师毕业，对于办理中学及进行中学的教育改革还没有经验，又因为中学师资的人才，在我熟悉的友人当中，也比较缺乏。所以，我就心安理得的同意由新成立的县党支部提名，委任我作为一个县立文明小学的校长。可是，这个小小的县立小学，在我们天台这样的偏僻小县中，却也是一批旧绅士和封建势力所占据的巢穴。你揭了他的老底，他们也要和你拼命。他们看见当时的新县长委派我作了校长，自然也不便反对；但他们有一番阴谋诡计，采用拖拉的办法，自己躲到杭州的天台同乡会去，拒不移交。你多次催他，他也不睬不理，弄得你无可奈何。也就在这个同时，我的同学戴邦定，被委派为台州市立第六中学校长。而且，这个校长的权力，也比较的大。这是因为他把过去的第六中学、第六师范，以及台州女子师范和附属小学，都合并在一处，总称为浙江第六中学，而其下面则分为中学部、师范部以及附小部，而把女师部份则并入男女同学的中学部和师范部之

中。这规模是大的，真有教育改革的气派。那时的人选，是他自己作校长兼师范部主任，张槐生作中学部主任。而我，则被任小学部主任。这时，我在天台，很希望把县立小学校长的职位接受下来，再转手移交给我大台的同志。而我自己，则到临海去做六中的小学部主任。至于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到临海去做附小主任，原因很简单，除了朋友的友情和事业的兴趣以外，更主要的还是经济待遇。因为天台文明小学校长的束修（工资）只有每月二十元，而附小主任却有四十元之多。

那时，六中附小也催我这个主任催得急，而我，则须赶快把县立小学校长的权限接收过来。我多次去信催促前校长移交，可他却一直不理不睬。我当时就采取权宜的办法，会同县教育局（当时称劝学所）和县党支部代表，陪同我和另外两位教员，把学校大门的铁锁打开，三面作了清点。虽然原任校长没有在场，也算清了手续。这以后，我就把小学校长的职务，交给另外一位同事代理，自己就到临海，去做小学部主任，做我自己应做的工作。

可是，正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叛卖革命，发动“四·一二”事变，这就是以后说的杀害、逮捕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你要知道，这种政治上的突变，在当时，我们这批青年，你说是幼稚也好，是简单、纯洁也好，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从天台躲避出去，躲在杭州天台同乡会的老校长，他却看准时机，给我扣上一顶共产党的帽子，告到新委派来的反共的县长手里，说我是天台共产党的什么，说我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枪枝，说我带领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流氓，打入县立文明小学的大门，自己接收了校产。就是凭着这些罪状，这新县长就火急火燎的把我从临海骗回天台，立刻把我拘禁起

来。

那个时候，浙江的省防军司令部设在海门——也就是现在的椒江——的东山花园里。省防军司令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时司令部里由一位参谋长管事。我在天台被拘禁以后，当天晚上，就深夜起解，用一个“排”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一夜之间、走过一百二十里的山路。第二日清晨、到了临海、再乘小火轮送到海门。就是这样，我被关押在当时的东山花园，也即是省防军司令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我记得从天台起解的时候，天台一般人的谣言，都说我们这一批共产党，是要押解到半路上就要枪毙的。可我们三个人，竟然都被送到海门，虽然给关了起来，却没有立刻执行枪毙。

我记得当时的参谋长对我们进行审问，首先问我们是否自己承认是共产党。其次，是要我们交出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枪枝来。他们诬告我是共产党，我说不是；他们说我带着武装工人纠察队，打入文明小学，我也加以事实上的辩释和否认。但对于我是共产党的罪名，则说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明明写着，号召人们“向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是的，我在那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题目叫做《对人们说的话》，登在一个刊物叫《互助》的上面，它的结尾一句，是号召人们“向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路上走”。这是白纸黑字，我是不能抵赖的。因此，我就得加以说明。我记得，当这位参谋长把我的老底揭出以后，我就自己承认下来，我的确写过这篇文章，我那文章中的确有那一句话。但是，我得说明，我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和共产主义不同的名词，它的音译的名字，是“安那其”。“安那其”的内容，主要是无政府主

义，所以简称“无政府主义”；如果和经济上的制度联系起来，才讲到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是整个的名词，是“安那其”的意译，它的本质，是根本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所以，号召向着无政府共产主义路上走，根本不同于宣传共产主义，更不能说是共产党员的明证。

后来，我的书面辩护总算被默认了。但主要原因，还是：一、当时的省防军司令要调动；二、也是由于我在社会上有有力者的担保，所以，我在海门东山花园被关押了两个月，终于被释放出来了。

现在说来，一九二七年的海门东山花园，早些时候，虽然是黄楚卿的私人花园，但事实上已是省防军司令部总部，而对我这个当时被诬为共产党，而且被囚禁的青年来说，却是一处临时拘禁我们的牢狱。我当然不敢夸大其词，说自己是怎样革命或对革命有什么贡献。但我们三个人的被捕，而且关在东山花园两个月，事实上，却是开了台州地区反共清党第一炮的作用。不是吗？由于我们三个人的被捕与拘禁，临海六中校内的共产党支部不得不转入地下，甚而至于解散。接着，台州的革命青年组织——“读书社”也受到压迫，许多读书社的负责同志，如王观澜、林攸棉（迪生）等不得不离开台州，到处隐蔽。所以，我们三个人的被捕与拘禁，实是记载着台州地区革命势力被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压迫与破坏的转折点、里程碑。

其次，台州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当年省立第六中学党支部的成立与解散——开始是发展党员，而后由这些党员分散并且转入地下组织，领导各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三门亭旁乡的农民暴动，都不能说和六中的党的建立没有关系。我记

得，当时的六中党支部，有李圣悦（即李平心）、管容德（以后被国民党逮捕以致叛变。但在当时却干得有声有色，有一定成绩的）等教师，以及学生梅其彬、叶其夔等人，对于台州各地组党及发动亭旁暴动，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三，对我本人来说，在我毕生的生命历史上也曾起过很大的作用。记得在当时，我和另外两个青年——王槐（柏青）和金良汴（平欧）同时被关押，在保释出来以后，王槐可能到苏区去了，但也没有明确的消息，这是最积极的路。金良汴后来进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做过一任哪一县的县长，解放前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如今已死在台湾，那是应有的归结。只有我还在这里。这几十年来，我虽然做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但在保释以后，回到上海，却真的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所以，海门东山花园这一段生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有意义的一段生命经历。虽然我以后又因为另外的一些原因，离开了党组织，但那一段历史与经历，对我来说却是有重大意义的。

朋友！我对你说这些我个人与东山花园有关的琐事，你不会笑我在为自己编造什么光荣的历史吧！不是的，我之所以说明这一段经历，主要原因，无非想要说明在海门东山花园这一地点里，曾经发生过对台州地区的革命运动发生过有影响的作用而已！至于到了后来，这东山花园，办起东山中学，在这个东山中学里，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这就成为东山中学的光荣的历史和成绩。我因为没有亲身的感受，这里也不便多说。虽然现在中国有名的书法家、当年的东山中学教师陈叔亮同志，当年怎样离开东山中学，一个人前往陕北去参加革命，那

事的经过我也是知道一些，但在这里，我想，这不必由我来叙述和介绍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二日于上海）

### 作者简介

许杰，浙江天台人。现代文学家，大学教授。早年以写故乡风土人情著名，《惨雾》乃代表作品，鲁迅先生曾称其为乡土文学作家。解放前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等职。抗日军兴，一度回原籍担任大公中学校长，并聘请共产党员为教师，发展共产党组织，传播革命火种，使大公中学成为台州红色堡垒之一。解放后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晚年为上海写作学会名誉会长。一生著作很多，其小说、散文、文学理论均有专集问世，极负盛誉。

# 回忆哥哥毛贤友

毛建予口述 胡毅博记录整理

毛贤友，原名铁荣（1917年3月——1950年8月25日），湖南平江县曲池村学堂坡人。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淳朴、待人至诚、追求真理。高小毕业后，家庭经济困难，兄弟六人仅靠大哥一人种田，难以继续升学，而他求学心切，考入长沙枫林学校半工半读。入学后，将铁荣去掉“荣”字，留一个“铁”，笔名“成钢”，喻意“毛铁成钢”以示其志。在校期间，生活极为艰苦，每天煮半斤米，加一个铜板的豆腐，早晚两餐，整整过了两年。后考入衡山师范，相当现在的大专。

哥哥在校期间，非常关心我和弟弟的学习，经常寄《呐喊》、《狂人日记》之类进步书籍给我学习。寒暑假回到家里给我讲授语文、数学，要我去投考学校，当时我觉得自己没出息，他将我原名润华改为“见予”，其意谓看到自己的力量，不要自悲。解放后，我才改为“建予”。我是当地第一批参加工作的妇女。

1939年，哥哥在衡山师范组织学生运动，参加共产党，积极宣传抗日，曾将撕毁日本旗的照片寄给我们。毕业后，由一位老师介绍到浙江金华“工合”工作，后到海门，担任“中华全国工合华东办事处”主任。这是一个由外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办的进步的援华组织。他以合法的身份进行工作，经常同党取得联系。他写的学习《资本论》的文章，发表在上海

的进步刊物上。

以革命为重，是哥哥的一向品质，他参加工作后，从不寄钱回家，他来信说：“天下比我们苦的人更多。”妈妈见信生气。那年冬，他回家买了一件皮衣给妈妈，妈妈不满意地说：“我不要，去分给你的贫苦兄弟吧！”他並不介意。每年除给弟妹寄点文具，仍不寄钱给家里。

1948年，应为民同志（当时中共路椒工委领导）在哥哥单位住了一晚，被叛徒告发，特务机关派人捉拿应为民扑了空，搜查中发现与我哥哥往来的信件，就将我哥哥抓了起来。当时正是5月份，他结婚不到一个月，嫂嫂陈浩燕急坏了，我请自己一位同学的父亲作保，保不出。我的一位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印刷厂工作的舅舅请两桌菜，由于嫌疑大，仍然保不出。后来请堂兄毛懋犹帮忙，因他曾在十八军做过事，任湖北省安石县长，王东源任湖南省长时，他当过专员，属国民党C C系，他向王东源讲，毛贤友是我的弟弟，我们地主家庭不会有这样的子弟。王东源拍电报到浙江，由毛懋犹亲自到浙江取保。保出后，暂住在C C系管辖的地方。当地特务觉得不能这样宽释，意图把他重新收监。为了避免麻烦，毛懋犹便把贤友带回湖南平江老家。路过上海时，毛贤友曾设法避开堂兄，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面见应为民同志，向他汇报了入狱及营救经过，暂时回到湖南平江。

哥哥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家期间，都不忘革命。嫂嫂陈浩燕是他与应为民介绍入党的，在狱中，他曾捎口信给嫂嫂说：“我有病，有几个月没领工资，你拿着作路费，去上海找‘母亲’（党），到那里去读书”。他在家里，继续宣传党的政策。当时我们家有国民党军队的碉堡，驻扎一个连的兵，他常常

向当兵的讲解放战争的形势，使士兵受到教育，厌恶内战，不想当兵。他常常半夜把那些不愿当兵的人悄悄送走，几乎把这个连搞垮了。

平江解放了，他带领我们贴标语迎解放，将家里的米送给解放军吃。梁书文县长很赏识他，要他在县政府文教科负责，教师都叫他毛科长。我问过梁书文同志，他说当时刚解放，没有任命书，只指定负责，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到了49年12月，梁书文同志告诉我哥哥，你原来在浙江工作，要去原地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接着他就到浙江台州，就在台州专署实业科合作股担任副股长。50年8月，在宁海前童工作时，与国民党残匪遭遇受害。

**编者按语：**这篇文章是毛贤友烈士的遗孤毛解南同志从湖南长沙寄来的。毛建予是毛贤友的胞妹，根据她的口述，由湖南平江文史馆胡毅博同志记录整理，本刊仅作文字上的修改。

# “工合”中党的好干部

## 毛贤友同志

金礼正 金礼巧 金礼让

抗日战争初期，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同志等办起了一个先进的群众组织，叫“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工合”当时的经费来源靠国际进步人士的募捐，主要任务是组织失业工人成立各种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并团结各界人士支援抗日战争，因为得到宋庆龄同志的赞助，“工合”得以向国民党政府办理了登记手续。

毛贤友同志早年在金华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区办事处”工作，后来再从金华到浙江丽水工合事务所工作，在白色恐怖严重笼罩下的1941年，又派到浙江海门，在“工合临海指导站”担任主任指导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指导站改为“浙东事务所”，他担任主任职务。

毛贤友同志来海门后，经常深入周围地区访贫问苦。为了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并为革命活动创造群众基础，贤友同志着手在海门周围地区组织“信贷合作社”和“渔业合作社”，“渔业合作社”由“工合”提供无息贷款，组织生产，与当时的渔霸奸商作斗争。

1942年，毛贤友同志首先在海门、葭芷组织了二个“工合保证责任渔业合作社”，第一渔业合作社由张志清任经理，第二

渔业合作社由李大富任经理。每年古历二、三月由“工合”发放无息贷款给渔民搞生产，当时大约有渔船二十多对，每对贷款几百元，渔民卖鱼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再行出卖。当年秋场结束，扣除了贷款后结算有余，贤友同志放在海门红庙（现真空设备厂前面）摆了十桌酒菜，邀请渔民（当时叫社员）来会餐，餐后再把积余的钱分给社员。第二年两个合作社合并，组成“海门渔业合作社”。

44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海上的严重破坏，渔业生产每况愈下，渔民无力偿还当年的贷款，加上伪币贬值，这些贷款实质上等于无偿地给了渔民，

贤友同志在我的老家北岸（属临海杜桥区）也积极组织渔业合作社，发放无息贷款，还带着国际救济总署拨给的剩余物资衣、被、尼龙蚊帐和雨衣等，叫我叔父金崇善带路亲自挨村挨户访贫问苦，送到渔民手中。他几乎走遍了每户渔民家庭。如有渔民上门来，贤友同志也都热情地让座请茶，问寒问暖，有时还留吃饭。所以在48年渔民听说贤友同志被捕时，焦急万分，纷纷流下悲伤的眼泪。

当时我祖父金寄桴是教育界和水产事业上的知名人士，是无党派的爱国民主人士，曾积极协助贤友同志搞渔业合作社并掩护他搞革命工作。所以毛贤友经常来我的老家——杜桥汇头村同我祖父联系工作。每次来他手中总是带着二袋糖果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几个兄弟吃，我们几个兄弟总是亲热地喊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便牵着我们的手，抚着我们的头发，跟我们一块到我祖父的房间。

毛主席经常居住在我们老家和老家附近我祖父办起的一所学校里——渔民小学（现叫汇头小学），特别是在形势紧张时

住的时间较长。那时学校办得很兴盛，威望很高，远近的人都来读书。毛贤友同志住在学校里，师生们都叫他毛先生，他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每次拍毕业照时，他总是和蔼地跟同学们在一起，我们记得童年时也曾和他一起在留声机前留影。

毛主任除同我祖父有很好关系外，还经常到我父亲金崇伟布店中来，教育我父亲要多为贫苦人服务，做生意要薄利，对穷苦人有好处的要多做。他也经常用各种进步思想教育和启发我叔父。

受皖南事变的影响，1942年原“工合浙皖区办事处”从金华撤退到常山，以后奉命撤消，下设机构合并成立东南区办事处。为此毛贤友同志到常山开会，当时会议由原主任孟受曾同志（地下党员）主持，发给海门4000元基金，毛贤友同志拿到后当即汇往海门，不料孟受曾同志一走，代理的人认为浙皖区办事处有一批人要遣散没有款子，硬要毛贤友拿出汇单追回这笔经费，毛贤友同志为了海门广大渔民，为了当时海门的各项工能顺利开展，就当场将汇单吃到肚里以示抗议，使得那个代理人大发雷霆，报告国民党常山公安局将他拘留，后幸经在常山的同志和好友蔡慎龄等营救释放，重返海门。

贤友同志在办渔业合作社时，还在椒江南北如洪家区的小板桥，上洋各地农村办起了合作社，积极支持农民搞好生产。贤友同志还在合法的掩护下，积极输送革命同志进山革命，并为山区游击队采购药品，1947年有一时期由于购买药品资金不足，贤友同志把自己的工资和平时积蓄慷慨地拿出来，不足之数还向有关方面借贷，完成了支援游击队的任务，致使他在这段时间里经济窘迫，但他对个人的困难始终处之泰然。

48年贤友同志被捕后通过各方设法营救，保释出狱回湖南